

近代居士徐蔚如 對華嚴學的貢獻

■ 趙化雨

蘇州大學哲學系

一、前言

居士在現代用語中多泛稱為在家專修佛道的男女眾，廣而言之，為全體信仰佛教之信徒優婆塞、優婆夷的總稱。而居士一詞在佛教東傳之前華夏已有之，《禮記》和《韓非子》中皆有記載，指有道德追求或才藝者隱居不求仕祿的處士。在原始佛教語境中，居士意為長者、家主，為古印度四姓中吠舍種之大富長者，或在家修行的有道者。^[1]在原始佛教逐步發展至大乘佛教的過程中，居士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它已經同種姓觀念徹底決裂，並且脫離了原本與長者緊密聯繫的規範。」^[2]佛教傳入東土以來，最初在帝王將相、政商名流之上層階級中傳播彌漫。智者大師在《觀音義疏》中說：「居士者，多積賄貨，居業豐盈，以此為名也。」^[3]隋朝慧遠在《維摩義記》中云：「居

士中尊斷貪著者居士有二。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4]但

在佛教實際發展進程中，居士群體涉及的範圍更大、更加複雜，涵蓋了各個社會階層、不同行業。潘桂明先生認為，「佛教居士的主體」指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力的一批人，原因在於，富有家財之居士可以在經濟上資助佛教發展，具有政治等社會地位之居士可以外護佛教，德行文化素質高超之居士可以闡揚佛教教義，具有強大社會關係網之居士有能力將佛法傳播甚廣，攝受全體信徒。^[5]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盛行的中國，居士在佛教發展中的地位不可小覷。

近代以來，佛教發展幾乎趨於停滯，一方面有外敵入侵，社會動蕩不安，戰爭頻仍；另一方面有「洪楊之亂」、「廟產興學」之毀佛活動此起彼

伏。再加上佛教內部腐敗不堪、僧尼素質急劇下滑等狀況，整個佛教呈現出一片哀鴻景象。值此亂

摘要：僧侶與居士同為佛教發展中之重要組成部分，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近代以來，佛教面臨內憂外患，發展幾乎趨於停滯，故有精英居士階層崛起。他們或研究教理以推動佛學研究轉型，或刊印佛教經典、著書立說以催邪扶正、護持正法，或以佛陀救世慈悲精神為指導，身體力行救濟災民。

華嚴學者徐蔚如居士（1878-1937），家庭世代信佛，後聞得楊仁山「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八字便確立方向，從此繼承楊氏之志，與同仁道友相繼成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大量刊刻華嚴典籍，並立志刊印百納方冊大藏經以興教救世；徐氏雖無體系性華嚴思想，但眼界廣闊，其繼承楊仁山之華嚴思想，並能對佛教經典旁徵博引以催邪扶正，借華嚴圓教思想以引導群萌。天不假年，蔚如居士六十示寂，然徐氏之精神為後人繼承，故有更多華嚴典籍流布於世，居士為華嚴學復興厥功至偉！

關鍵詞：華嚴學者、徐蔚如、居士、華嚴學典籍、京津刻經處

世，印光大師觀察社會動態，屢次勸說居士們，亂世之際不宜出家，居塵學道獲益更大，他在〈復周群錚居士書四〉中勸周居士道：「汝在家篤修淨業，亦可為慈親生信念佛，以期了脫之道。亦可為兄弟在外，料理家門之事。亦可以率其妻室，弟婦等，同修淨業，同出輪回之計。外而鄉黨親戚，隨緣開導。即家舍為道場。舉慈親，及兄弟妻室子侄，鄉黨親朋，皆為法眷。隨力隨分，身率言化。」

[6]

僧侶與居士同為佛教發展中之重要組成部分，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一方面，居士離不開佛教內部高僧大德的開導與啟示、超拔與關懷，故而近代以清末民初四大高僧為代表的佛教僧侶周圍，常常具有規模龐大的居士護法群體，他們或為政商名流、或為學者精英、或為普通社會民眾；另一方面，佛教的滋長與壯大、繁榮與興盛離不開信眾居士們的精勤護持，可以說在某些歷史時期，居士群體具有決定佛教全局、扭轉乾坤的巨大作用。尤其是清末民初以來，佛教之前途命運基本掌握在護法居士們手中，不至毀滅消亡。^[7]

近代佛教之凋零破敗慘狀激勵著很多精英居士充當佛教振興的先鋒，他們大多具有高水準知識、高文化素養，以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為動力，共同推動佛教走出泥潭、使其枯木逢春。代表性人物有近代佛教復興第一人楊仁山(1837-1911)、佛學慧星譚嗣同(1866-1898)、佛學書局編輯余了翁(1873-1941)、一生行腳救災賑濟的高鶴年(1872-1962)、非佛書不讀的梅光羲(1880-1947，字擷芸)、華嚴學者徐蔚如(1878-1937)、早年佛教大護法葉恭綽(1881-1958)、推動西北佛教的康繼遙(1880-1969)、佛教史學者湯用彤(1893-1964)、創建台灣印經處的朱鏡宙(1890-1985)等一大批精英居士。^[8]面對衰敗的佛教困局，楊仁山為代表的金陵刻經處居士們率先對沉珂已久、積弊很深的佛教進行改革，由此掀起了居士佛教改革的熱潮，全國各處精英居士廣泛參與，從各個層面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由衰轉興。潘桂明先生將近代居士團體的佛教文化活動內容，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研究佛教思想、著書立論、推動佛學研究轉型；其二，刊印佛經典籍、出版佛教刊物以弘

傳佛教思想文化；其三，以居士團體為樞紐的慈善教化與救濟活動；其四，宣揚淨土念佛法門、推動信仰的彌散傳播。^[9]近代居士佛教中，能做到以上四點並且對華嚴學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行列中，徐蔚如居士十分耀眼。

二、徐蔚如居士生平

徐蔚如(1878-1937)，名文蔚，字蔚如，號藏一，浙江海鹽縣人，生於清光緒四年，自幼受母教導，攻經史子集百家之學，兼研算學，因母信佛，故而自幼禮誦佛經。蔚如居士之家「世世奉佛，至蔚十世矣，先曾祖雲鶴公七十歸田，專心淨業，易簣之際，預知時至，先一日沐浴剃度，步履如常，至時泊然坐逝。而亡弟文璠亦能起沐浴，合掌跏趺坐，念佛而逝。此皆家人之親見，故信入教易。蔚弱冠時，以家藏經論較多，幸得略知其部類。」^[10]蔚如居士家有學佛之氛圍，得之熏陶，故而對佛教有深厚之情；弱冠之年已對佛教經藏有基本了解，這也為其後期校訂、刻印、流通佛教典籍打下堅固之地基。

光緒二十四年(1898)，秋試不第後入京捐資為部郎，兼任京浙學堂算學教習，後相繼擔任京師地方審判所推事、通臬司郎中，於辛亥革命後，攜家眷寄居上海；民國初年，蔚如被公推為浙江省第一屆省議員，因袁世凱上台後黨禁嚴厲，省議會形同虛設。^[11]在此期間，徐蔚如參訪道場、禮拜佛塔、捐資金陵刻經處，甚至親自集資刊刻佛經典籍，足見其並未荒廢佛法研究。民國二年(1913)在《佛學叢報》上得見印光大師之文章，甚為仰慕；民國四年(1915)從周孟由處得印光大師舊信稿數篇，結集刊印，是為《印光法師信稿》。民國三年(1914)，蔚如再次赴京任財政部會計司司長，此時與教育部參事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相識並同研佛學；民國八年(1919)，蔚如再登普陀請求皈依印光大師，皈依未成，喜獲印光大師20多篇信稿，與原初所得信稿合印出版，名為《印光法師文鈔》；同年夏，徐蔚如編輯《楊仁山居士遺著》二十三卷^[12]，另附〈塔銘、事略、分家筆據〉一卷，於民國八年(1919)由金陵刻經處刊印^[13]，內容列表如下：



序號	卷數	作者	刊印時間
1	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4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2	佛教初學課本1卷注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3	十宗略說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4	觀無量壽佛經略論1卷 (願生偈略釋、壇經略釋附)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5	論語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6	孟子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7	陰符經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8	道德經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9	沖虛經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10	南華經發隱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11	等不等觀雜錄8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12	闡教編1卷	[清]楊文會撰，徐蔚如編	民國八年(1919)

民國七年(1918)三月，徐蔚如、蔣維喬與交通總長葉恭綽、鐵路督辦蒯若木、司法部之梅光羲等同志發起「戊午講經會」，眾人公推徐蔚如南下迎請諦閑老法師(1858-1932，法名古虛，字諦閑)北上講經，徐蔚如與蔣維喬皆皈依諦閑法師，蔚如法名顯瑞；諦閑法師南返後，蔚如居士與梅光羲、江味農、蔣維喬、黃士恒等創立「北京刻經處」^[14]，蔚如為總主持，校訂刊印經典。民國九年(1920)，因北方實業家周學熙聘請，擔任天津啟新水泥公司總秘書，定居天津。民國十一年(1922)，蔚如居士與許丹(1891-1953，字季上)同心同德，共同推動建立佛經流通處和天津刻經處，並與翟芴青、張伯麟、盛台南等同仁創建天津佛教功德林及蓮社。^[15]民國二十四、二十五年(1935-1936)間在天津功德林講《華嚴經大意》，風雨不輟，佛教界人士多讚譽蔚如為華嚴學者，社會大眾崇仰其為華嚴大師。^[16]從建立京、津兩處刻經處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往生前，徐蔚如居士一直致力於佛教典籍的刊印、流通與佛法的弘揚。印光大師讚其「中年力任，刊刻藏典；續佛慧命，資密及顯」、「蒙佛授記，即回娑婆；普引含識，同觀彌陀」。^[17]

三、徐蔚如的華嚴思想

(一)、繼承楊老，教宗賢首

徐蔚如是一位弘道者，繼承佛教傳統，推動華嚴學統再次興盛。因家庭世代信佛，故徐氏自幼接觸佛教，然世事變遷、人隨境轉，於不惑之年前後，得知楊仁山居士自定日課「教宗賢首，行在彌陀」而猛然醒悟，方真正確定鑽研之方向，並「竊自署為私淑弟子矣」。^[18]徐氏佛學思想豐富，對於華嚴、天台、密宗教理教義十分熟知，開導群迷、稱性發揮；引導居士，理事雙融；引經據典，信手拈來；顯密齊運，圓融無礙。因徐氏無體系性思想發揮，且以華嚴學說聞名，故此處僅述其華嚴思想。

徐蔚如助推華嚴學復興，關鍵在於受啟蒙於楊仁山對華嚴學之推崇。從兩處可以略知，其一，楊仁山西歸六年之後，蔚如受金陵刻經處之托，著手整理楊居士遺稿，搜集二十三卷並逐一編次，並為其作傳；蔚如引用《華嚴經·賢首品》中之偈子：「彼諸功德無邊際，不可稱量無與等。我今隨力說少分，猶如大海一滴水。」^[19]盛讚楊氏對佛教界貢獻之大。其二，楊仁山教宗賢首判教，承其思想法脈，接續五教(小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賢首立次五教)以頓教攝禪宗，以圓教該前四，教他宗立教，更為完備。」^[20]故時人遵從楊氏者眾多。徐蔚如雖與仁山居士無一日之雅，但徐

氏終生為楊氏之擁躉，一生服膺華嚴，足見楊氏對其影響之大，故而有徐氏不辭辛勞推動刻經活動的開展，以及數量龐大的華嚴典籍面世。

（二）、催邪扶正，見解超群

徐蔚如作為華嚴學者，雖無完整的闡述華嚴義理之詞章，但數十年深入經藏，使得他對各家經典有極精微的了解，特別對於華嚴經典有獨到之見地。

如民國二十二年（1933），徐蔚如寫了一篇〈普賢行願品文殊普賢章跋〉，一方面解讀〈普賢行願品〉作為淨土四經之一的關鍵原因，另一方面提倡將文殊與普賢並為一章，增進人們對《華嚴經》之領悟。跋云：

近代魏默深氏以此卷與淨土三經合刻，號為淨土四經，流通益廣。比者呂聖因女士復以排印此經見囑。文蔚竊惟賢首清涼二祖，以信解行證四分。判釋華嚴全經。此品判屬證分。品初如來入定現相。表所證絕言。而普賢開頭之，放光令悟。表能證絕言。而文殊開頭之，令諸菩薩頓證法界，名為本會。文殊啟發善財遍參知識。最後仍由文殊而見普賢。行願相扶。漸證法界。名為末會。本末交澈。頓漸該羅。不讀全經，曷窺玄妙。倘以文富義博，持誦難周。則當再觀文殊章起，所增不足兩卷。庶於經旨，可見大凡，末卷久已盛行。竊願為學者進一解也。爰自本品第三十八卷起，錄為一篇。付之排印。以其仍為本品四十卷之少分。故題曰文殊普賢章，並錄清涼科文於卷端。冠以華嚴處會品目表。或亦足為讀是經之一助歟。^[21]

增加文殊一章與普賢並列，可體現出「行願相扶」、「本末交澈、頓漸該羅」之微妙大法；增加清涼之《科文》，使得「文富義博、持誦難周」之《華嚴》變得清晰易解、大有助益。足見蔚如領悟華嚴之妙旨，獨運匠心。

然而，蔚如居士對於楊氏並非全盤吸收，而是有所揀擇。在〈轉錄徐蔚如居士復陳正有君書〉中，談及一般根器的學者與利根之人修習華嚴大法的步驟，蔚如云：

勸學者研究華嚴，先疏後論者，以疏釋疏體，解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解得十分，便獲百分之益，終身窮之而勿能盡。縱使全不能解，亦可受熏成種，有益而無損。論（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是論體。利根上智

之士，讀之有大利益。而初心學人，於各種經教既未深究，於疏鈔又未公寓目，則於論旨未易領會，但就論文蠻幹籠統讀去，恐難免空腹高心之病。如曹魯川是，孰先孰後，乃專為學者計。非於方山清涼有所憂劣，於其間抑亦本無憂劣可言也。然楊仁老自身之於華嚴，即是由論及疏。洪君夙根深厚，即亦何妨先論後疏，但未可以教普通人耳。^[22]

普通人學習《華嚴經》的次序應該是先從清涼國師之《華嚴經疏》入手，再去見李方山之《華嚴合論》，二者雖無高下之分，但普通根器之人若不遵循次序便如曹魯川之輩而有驕傲自大、空腹高心之毛病。利根之人如楊仁山等，則可不設階梯。

再者，面對居士對於李長者將十分諸佛國土定義為權非實，徐蔚如以華嚴解華嚴，給予了圓滿回答。其云：

十地菩薩所居他受用土，尚判之為權，況九品往生之凡聖同居土哉。願極樂勝妙不在寂光實報而在同居，即權即實，遂為《華嚴》關鍵。此但可為智者道，難與淺人言耳。若有實無權，則十方諸佛，無以溥他力之大用，即六道眾生，無由獲解脫之要門。一代時教，隱實施權與抑權揚實皆權也。而在華嚴教中，即實而權，即權而實。權實互容而不相礙。方山之判淨土，亦與行願末卷無違，但或以權實作優劣觀則大誤，此誤在學者，不誤在方山也。^[23]

蔚如居士解讀《華嚴》，認為理事雙融無違，實權相即無礙，此真正展現了華嚴學義理的微妙奧旨、圓滿智慧。

此二論可知，徐蔚如居士是一位利根的佛教學者，雖無專門而系統之思想流傳後世，其機鋒辯聰、催邪顯正、護持正法之智慧與精神足以啟迪後繼者。

（三）、圓融法界，行在淨土

蔚如因楊仁山之「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八字而有所醒悟，不久便在《佛學叢報》中得知印光老法師之淨土弘法文章，由此更加傾慕不已。徐蔚如說：

貞元（785）間，全品（〈入法界品〉）梵文至，譯成四十卷，雖全經未具，而此品則已完全無缺矣。賢首撰《探玄記》，釋晉譯本。清涼繼之，撰疏鈔釋唐譯，復

另撰疏釋此四十卷之新經，又為《別行疏》，釋此四十卷之末卷。圭峰為之鈔，以此一卷，為華嚴之關鍵也。千載而下，欲由華嚴教海以契彌陀願海，端賴此書，無不由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24]

由此而得，蔚如與楊仁山異口同聲，皆是教宗賢首、行歸淨土之居士。楊仁山在《佛說觀無量壽經略論》中指出，菩薩行門，不出二種。一者上求佛道，二者下化眾生。前文見佛聞法，受菩提記，是上求功極。後文觀想九品往生，是下化之性。是故前之觀法，全以自心投入彌陀願海。後之觀法，全攝彌陀願海歸入自心。如是重重攝入，周遍含容。誰謂華嚴極樂有二致耶？^[25]

西方淨土與華藏世界相互函攝，本無區分。《徐文蔚君答某居士問二十一則》中，某居士問：

《華嚴三昧論》若修圓教為因，深達實相，以普賢行願回嚮往生，便感得實報土，親承佛記，分證寂光。今某雖未深達實相，然頗能以深信心持誦《行願品》，回向眾生，同歸極樂，亦屬普賢行願中之一事，似此亦可感得實報，分證寂光否？^[26]

答云：

《華嚴三昧論》此皆純是一乘圓教菩薩境界，故感實報莊嚴土，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法身，是為分證寂光。《華嚴經》言初發心便成正覺，初發心者，即起信論信成就發心，所謂十信滿心是也。至此便能入相成道位在初住，淨宗修十六觀，至第九觀成就，超出上品上生之上。現在蒙佛授記，判位亦在圓初住。（宋靈芝律師及近代楊仁山居士如是說）華嚴極樂，本無二致也。然而此等境界，未易驟幾。博地凡夫，由惑造業，一分未盡。若在此土進修，非斷三界見思惑盡，不能永斷輪回，惟淨土法門，如已斷業惑證真，正好面見彌陀，親承授記，感實報土。分證寂光。非為分外，即或未能伏斷，亦可隨念往生，徑階不退，所以靈峰《彌陀要解》，倡言極樂勝妙，惟在同居一土也。帶業往生，本是隨情之言，楊居士《佛教初學課本》（四十一頁）詮釋最精。又四土三土之說，亦未可執，楊居士有《論彌陀報土文》一篇，特錄呈覽，竊謂我輩但得往生極樂，縱見佛受記有遲速，其為徑階不退則一，信心受持《行願品》至花開見佛時，終得同此功勳，願無疑焉。^[27]

由此一問一答可推知以下三點結論，其一，蔚如與楊仁山共同遵從「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之原

則，融會華嚴思想與淨土行持；其二，楊氏文章包羅萬象，蔚如多從中吸收接納並作為論證的依據；其三，蔚如並系統化獨創性思想發揮，這與楊氏豐富的華嚴思想有密切關係。

四、徐蔚如對華嚴典籍刊刻之貢獻

（一）、刻經處成立背景

近代以來，居士佛教引領佛教發展的前沿，通過多種方式振興衰敗已久的佛教。頗為顯著的當屬楊仁山居士與其同仁創立金陵刻經處，他「生前主持刻經事業近五十年，刻印佛經三千餘卷」^[28]，並得到全國多處刻經處的回應，如鄭學川^[29]（1826-1880）創立的江北刻經處、曹鏡初創立的長沙刻經處等。這顯示出以楊仁山為代表的居士群體，迫切渴望通過刊刻佛經以振興佛教之決心。徐蔚如正是在楊文會憂國憂教精神感召下，相繼與護法居士們創辦了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通過刊印方冊大藏經，以完成楊氏之心願。提到楊文會對徐蔚如之最初影響，在〈徐文蔚（蔚）復某居士書〉中徐氏自述，弱冠之年後，「馳驅南北，垂二十年，西閱東翻，毫無所得，時作時輟，亦無定課。前年（1914）聞人述楊仁山居士自課為「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八字，為發猛醒，依此八字探究，始覺漸有軌轍可循。自是以來，日有定課，幸未間斷。蓋蔚於楊居士雖未獲一見，竊自署為私淑弟子矣。」^[30]由此可知，徐蔚如居士堅定佛教信仰，每日定課的習慣也受到楊居士的影響。定課中他將〈普賢行願品·普賢偈〉作為必修之內容，且每日清晨跪誦一遍，每願一拜。從佛教研修角度看，楊氏乃蔚如迷途之嚮導。不久，徐氏又從《佛學叢報》上讀得印光法師文章，從此仰慕不已。由此自述經歷可知，印光大師乃徐氏茫茫業海之寶筏，徐氏從此竭盡全力護持印光大師，刊刻經典，流通《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九年（1920）因工作變更後遷居天津，「位卑不敢忘憂國」、轉業從未忘興教，旋結識許季上居士並在天津佛教流通處的基礎上成立天津刻經處（1922年成立）。自北京刻經處（徐氏主持20年）和天津刻經處（主持16年）成立至徐氏往生，刊刻的經典近兩千卷，其工程量之浩大、品質

之精良、工藝之精湛、揀擇之謹慎，為多位民國高僧褒獎。同時，刻經處常人手不足，1921年前後，梅光羲調任山東審判庭廳長，蔣竹壯和江味農回滬，北京刻經處由徐氏一人主持^[31]；加上徐氏有家眷照料，工作忙碌，如民國九年（1920）前他在北京財政廳任職，此後在天津啟新水泥公司任總秘書，閒暇之餘，還能把精力投入到刻經事業之中，若無大悲大願、興教救世之菩薩道精神，絕難有如此之成就。

（二）、京津刻經處之貢獻

民國六年（1917），徐蔚如受金陵刻經處之托，編成《楊仁山居士遺著》總計二十三卷，收錄楊氏佛學及相關著作十二種，其中楊仁山居士事略，由徐蔚如親自執筆完成，楊氏《遺著》兩年後由金陵刻經處付梓刊印。《近代往生傳》（楊慧鏡輯）收錄了徐蔚如為楊文會執筆書寫的往生傳。有此特殊因緣際會，徐氏自然知曉楊仁山居士之未了遺願，故而集合北京、天津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儘快完成重刻方冊大藏經之願。^[32]自北京刻經處

成立之日起，即與金陵刻經處緊密合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版式、裝訂與金陵刻經處相同；其二，金陵刻經處已經刻印的，北京刻經處不再刊刻；若發現兩刻經處重複的內容，北京刻經處會立即停止，或付錢轉交金陵刻經處完成。

自唐五代以後，華嚴宗漸趨衰微，華嚴典籍不斷亡失。自清以降，華嚴學著述已不多見。楊仁山成立金陵刻經處之志願便在於搜集大批典籍，為近代重振佛教、興教救國盡心盡力。楊氏曾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旅歐三年，其中結識日本真宗僧人南條文雄，因此獲得大量佛教注疏，使其刻印流通。徐蔚如繼承先師楊氏之志，於其示寂之後，竭盡全力搜購刊刻華嚴典籍。武漢大學姚彬彬曾對羅錚整理的〈金陵刻經處的刻印經籍和流通目錄〉^[33]專門統計，並整理出楊氏生前華嚴類佛學典籍刊印之表格。

表一：楊仁山生前金陵刻經處刊印的華嚴類典籍^[34]

序號	題名	卷數	譯作者	初刻時間	備註
1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略疏	1	[唐]法藏述	同治八年五月(1869)	簡稱《心經略疏》
2	大方廣佛華嚴經要解	1	[宋]戒環集	同治十一年八月(1872)	簡稱《華嚴經要解》
3	華嚴經合論	120	[唐]李通玄	同治十一年八月(1872)	
4	大乘起信論纂注	2	[明]真界撰	光緒十一年六月(1885)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吞海集	3	[宋]道通撰	光緒十三年三月(1887)	
6	大乘起信論直解	2	[明]德清撰	光緒十六年三月(1890)	卷末附識：該書由上海林森中路大雄書局流通
7	法界觀披雲集	1	[宋]道通撰	光緒十六年四月(1890)	
8	禪源諸詮集都序	4	[唐]宗密撰	光緒十八年二月(1892)	簡稱《禪源詮》
9	入楞伽經玄義	1	[唐]法藏撰	光緒十八年四月(1892)	
10	華嚴法界玄鏡	3	[唐]澄觀撰	光緒二十一年一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他本重刊
11	華嚴玄義章	1	[唐]法藏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2	十世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3	法身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4	圓音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5	法界緣起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6	流轉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7	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據卷末跋，該書據光緒二年江北刻經處刻本重刊。
18	華嚴經義海百門	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1895)	簡稱《義海百門》
19	大華嚴經略策	1	[唐]澄觀述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1895)	
20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2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1895)	
21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	3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	
22	華嚴五十要問答	2	[唐]智儼撰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1896)	
23	華嚴一乘十玄門	1	[唐]智儼撰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1896)	簡稱《十玄門》
24	華嚴經五祖略記	1	[清]續法撰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1896)	
25	三聖圓融觀門	1	[唐]澄觀撰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1897)	
26	答順宗心要法門	1	[唐]宗密注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1897)	
27	大乘起信論別記	1	[新羅]元曉撰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1897)	
28	華嚴宗主賢首國師傳	1	[新羅]崔致遠撰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29	大乘起信論	1	[唐]實叉難陀譯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	據卷末注，此經以《宋》、《元》、《明》、《麗》四藏讎校，擇其善者而從之。
30	大乘起信論義記/大乘起信論別記	7/1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二種合冊刊行
31	大乘起信論疏記會本	6	[新羅]元曉撰	光緒二十五年一月(1899)	即《起信論海東疏》
32	華嚴處會總要之圖	1	[明]祿宏撰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	後收入《雲棲法匯》
33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	10	[唐]法藏撰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	
34	佛說盂蘭盆經疏	1	[宋]淨源撰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	
35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	15	[唐]宗密疏鈔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1906)	簡稱《華嚴行願品疏鈔》
36	大宗地玄文本略注	4	[清]楊文會注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1906)	
37	華嚴懸談	28	[唐]澄觀述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1907)	
38	大方廣圓覺經大疏	16	[唐]宗密述	宣統元年七月(1909)	
39	遊心安樂道	1	[新羅]元曉撰	不詳	
40	華嚴著述集要	不詳	金陵刻經處輯	不詳(應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以前)	今未見

(注：華嚴宗人著述及非華嚴宗人的有關華嚴著述均收入此表)

楊仁山生前搜集、刊刻、流通了大量的華嚴典籍，在其歿後，徐蔚如居士聯合同仁，繼承楊氏刻印流通典籍、興教救國之遺志，共同為近代華嚴

經典流通、華嚴義學興盛盡心盡力！

表二：徐蔚如根據楊氏遺留之大藏輯要而編輯的目錄提要^[35]（僅摘錄與華嚴學相關典籍）

序號	題名	卷數	譯作者	時間	備註
1	大方廣佛華嚴經科文/疏鈔	10/240	[唐]實叉難陀譯；[唐]澄觀撰科文、疏鈔	1927.2月《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	待刻，舊會本不全
2	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1	[唐]大廣智不空譯	1927.2	金陵刻經處
3	法界頌釋	1	龍樹菩薩造，[宋]北印度善施護譯；[清]續法釋	1927.2	金陵刻經處
4	華嚴金獅子章解	1	[唐]法藏述；[宋]普水淨源解	1927.5月《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	金陵刻經處
5	華嚴指歸	1	[唐]法藏撰	1927.5	金陵刻經處
6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1	[唐]法藏撰	1927.5	金陵刻經處
7	一乘教義分齊章	4	[唐]法藏撰	1927.5	金陵刻經處，一名《華嚴教分記》，古本三卷。
8	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	1	[唐]李通玄撰	1927.7月《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	金陵刻經處
9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	4	[唐]李通玄撰	1927.7	金陵刻經處
10	原人論	1	[唐]宗密撰	1927.7	金陵刻經處
11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世門頌注	3	[宋]本嵩撰頌；[元]琮湛注	1927.10月《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	金陵刻經處
12	賢首五教儀開蒙	1	[清]續法撰	1927.10	金陵刻經處
13	華嚴感應緣起傳	1	[清]弘壁輯	1927.10	金陵刻經處
14	華嚴念佛三昧論	1	[清]彭際清撰	1927.10	金陵刻經處
15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1	[唐]實叉難陀譯	1927.10	金陵刻經處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1	[唐]提雲般若譯	1927.10	金陵刻經處
17	大方廣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1	[唐]實叉難陀譯	1927.12月《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	金陵刻經處
18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	1	[唐]實叉難陀譯	1927.12	金陵刻經處
19	大方廣圓覺經匯疏	2	[唐]佛陀多羅譯；[唐]宗密撰疏	1927.12	揚州藏經院
20	大方廣圓覺經直解	2	[明]憨山德清撰	1927.12	待刻
21	大方廣圓覺經近釋	6	[明]通潤釋	1927.12	金陵刻經處
22	十地經論義記	23	天親菩薩造論；[元魏]菩提流支等譯；[隋]靜影慧遠撰記	1927.12	金陵刻經處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	1	[唐]大廣智不空譯	序號23-37同出自《大雲·續大藏輯要目錄提要》	未刻
24	十地經論	12	天親菩薩造； [元魏]菩提流支等譯		金陵刻經處
25	十住毗婆沙論	15	龍樹菩薩造； [姚秦]鳩摩羅什譯		磚橋刻經處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記	60	[唐]智儼撰		天津刻經處(原本不全,後從《大正藏》獲得丟失之卷)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	120	[唐]法藏撰		天津刻經處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	60	[唐]澄觀撰		金陵刻經處
29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	8	[唐]智儼撰		金陵刻經處(總141門,缺最後音義一門)
30	華嚴三昧章	1	[唐]法藏撰		金陵刻經處
31	華嚴經傳記	5	[唐]法藏撰		天津刻經處
32	華嚴經音義	2卷附1卷	[唐]慧苑撰		天津刻經處
33	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	1	[宋]淨源撰		北京刻經處
34	圓覺經略疏之鈔	25	[唐]宗密撰		揚州藏經院
35	圓覺經大疏	26	[唐]宗密撰		天津刻經處
36	圓覺經道場修證儀	18	[唐]宗密撰		未刻
37	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	1	[宋]淨源撰		未刻
38	華嚴經疏科文表解	10	[唐]澄觀撰； [民]徐蔚如、李圓淨等編		

徐蔚如自民國初年以來，一直致力於從海外搜尋珍貴華嚴典籍，至其晚年，得清涼澄觀之《華嚴經疏科文》十卷完整版，丁丑（1937）之春，「蔚公特由津寄貽李圓淨居士，尋復南來，入山（莫幹山）訪商校印。」^[36]然世事無常、生死迅速，蔚如居士於丁丑之秋示寂。西海學人王蘊為《華嚴經疏科文表解》之完成待出版作一緣起，云：

華嚴為諸經之王，法門寶藏，廣大無垠，允為如來說法之第一勝義。吾人潛研藏典於華嚴一經，儻缺受持讀誦，直可說寶山不識，智海未窺。獨惜蔚公一生服膺華嚴，而於疏鈔校刻，歲月遷延，未竟其志。近居士毅成表解，足為重刻疏鈔之先導，庶可告慰九泉。即論此編，鈞稽看似平常，而苦心孤詣，頗竭髮積之力，使

研誦本經者，得以綱舉目張，七處九會，直溯宗源，六相十玄，深解義趣，其為益願亦溥矣。^[37]

一生服膺華嚴之蔚公，識得華嚴典籍之寶藏，親自由津回南方與圓淨居士商議並校訂刊印，然天不假年，蔚如西去之後，李圓淨居士接手，由黃幼希居士「悉心勘校，正其紕繆，搜集經年，稿凡三易」。華嚴宗持松法師為《華嚴經疏科文表解》作序，云：

今而後讀華嚴者，因科文以尋疏鈔之條貫，因疏鈔以發經文之奧藏。又豈僅讀其文乎？將復以解其義也，又寧徒解其義乎？將復使遮那富貴纖毫悉陳乎眼底也。^[38]

由此可知，蔚如與李圓淨、黃幼希等居士，為

《科文》最終刊印出版之功莫大焉。

徐蔚如曾在示寂前一年（1936）去信李圓淨居士，並告知其遺願，其一為重刊《華嚴疏鈔》；其二為重定藏目，完成大藏提要。因為《華嚴疏鈔》錯誤較多，天津居士林刊停刊等原因而未能如願。

^[9]民國二十五年（1936），徐蔚如、周叔迦等以北平刻經處名義發起刊印方冊大藏經。〈募集補刻方冊大藏緣起〉一文大意为：自宋以降，各朝刊印大藏，至今獨清之龍藏刻版存之，申請刻印手續繁雜、費用昂貴且持誦不易；同光之際，釋妙空首創磚橋刻經處、釋貫如立揚州藏經院、楊仁山創金陵刻經處，各地刻經處亦蜂擁而起，然皆單打獨鬥，難以匯成全藏流通；雖有頻伽精舍影印宋版磧砂藏，然字小行密難以讀誦、校勘不精錯誤較多、珍貴經典多有遺失。若各刻經處之間聯合起來，刊印大藏優勢明顯，費用較低、設備齊全，所用經論較為精緻，一旦出現問題可及時得以解決。蔚如等居士為刊印完美無瑕的大藏經披肝瀝膽、嘔心瀝血，以興教為己任，發揮佛陀慈悲利世之精神，足為後人敬仰！

五、結語

有人稱近代佛教為居士佛教，雖有過讚之譽，但從另外一面可以解讀出居士力量的崛起，且足以扛鼎。近代精英居士們為佛教的復興貢獻甚大，而徐蔚如居士雖與楊文會無一日之雅，但自私淑為其弟子後，繼承楊氏之精神，堅定不移，於華嚴學之復興厥功至偉。在華嚴思想方面，徐蔚如繼承了楊仁山居士之思想脈絡並有所發揮。徐氏並無獨創性之構思，而從現有資料看，其對佛教的研究精深宏偉，可觸類旁通，圓融無礙。他將其主要精力放在刻經事業上，傳楊氏之衣鉢，補刊刻經典之疏漏，將華嚴經典之寶華展示於眾，故而徐氏對華嚴宗、對於佛教之貢獻不在於開拓創新、自成一派，而在於催邪顯正、護持正法、興教救世。

[1] 《佛光大辭典》在線查詢，居士，第3187頁。

[2]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頁。

[3] 《觀音義疏》卷2(CBETA, T34, no. 1728, 頁934c6-7)。

[4] 《維摩義記》卷1(CBETA, T38, no. 1776, 頁441b19-21)。

[5] 同[2]注，第4頁。

[6] 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增廣上）（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重版），第224頁。

[7] 同[2]注，第5頁。

[8] 於凌波著：《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9]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4頁。

[10] 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51卷）2006年，第427-428頁。（據《海潮音》v.2,n.9, 頁33-34原刊影印）

[11] 同[8]注，第464頁。

[12] 楊仁山撰，徐蔚如編：《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一冊）（南京：金陵刻經處，1919年）。

[13] 楊之峰：《北京刻經處述略》，《新世紀圖書館》，2011(3)。

[14] 北京一稱謂變化多次，民國元年即1912.1-1928.6月，稱北京；1928.6-1937.7稱北平；1937.7-1945.8年稱北京；1945.8-1949.9年稱北平；1949.9至今稱北京。下文談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徐蔚如等居士以北平刻經處名義募集補刻方冊大藏，北平與北京為同一處。

[15] 徐慕維：〈許季上居士略傳〉，《法音》，1990(2)。許季上曾在天津啟新水泥公司任職，後在開灤礦務局任秘書，與徐蔚如曾為同事。

[16] 同注[8]，第467頁。

[17] 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重版），第199頁。

[18] 同注[10]（第151卷）2006年，第427頁。（據《海潮音》v.2,n.9, 頁33-34原刊影印）

[19]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4（賢首品），CBETA, T10, no. 279, 頁72b1。徐蔚如所引與《大正藏》有微小出入，經文中顯示徐氏整合兩句為一個偈子。

[20] 同注[10]（第34卷），2008年，第72頁。（據《天津佛教居士林刊》n.1, 頁55-62原刊影印）

[21] 同注[10]（第48卷）2006年，第286頁。（據1933.06《佛學半月刊》n.57, 頁12原刊影印）

[22] 同注[10]（第12卷）2006年，第101-102頁。（據1923.03《佛光》n.1, 頁53-57原刊影印）

[23] 同注[10]（第12卷）2006年，第102頁。（據1923.03《佛光》n.1, 頁53-57原刊影印）

[24] 同注[10]（第151卷）2006年，第42頁。（據《海潮



音》v.2,n.9,頁33-34原刊影印)

[25]楊文會撰，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第174頁。

[26]同注[10](第151卷)2006年，第426頁。（據《海潮音》v.2,n.9,頁26-33原刊影印）

[27]同注[10](第151卷)2006年，第426-427頁。（據《海潮音》v.2,n.9,頁26-33原刊影印）

[28]劉成有：《近現代居士佛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55頁。

[29]武元康：〈妙空法師和江北刻經處〉，《佛教文化》，1999(1)。鄭學川，1866年出家，法名妙空，自號刻經僧，妙空法師同為金陵刻經處創立人之一，後又於揚州創立江北刻經處。

[30]同注[10](第151卷)2006年，第427頁。（據《海潮音》v.2,n.9,頁26-33原刊影印）

[31]同[8]注，第465頁。

[32]楊之峰：〈北京刻經處述略〉，《新世紀圖書館》，2011(3)。

[33]轉引：羅錚：《金陵刻經處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58-181頁。

[34]姚彬彬著：《現代文化思潮與中國佛學的轉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225-228頁。

[35]序號1-3，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34卷）第223-228頁，2008年（據1927.02《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n.2,頁105-110原刊影印）；序號4-7，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34卷，第351-355頁，2008年（據1927.05《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n.3,頁75-79原刊影印）；序號8-10，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34卷）第487-490頁，2008年（據1927.07《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n.4,頁75-78原刊影印）；序號11-16，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35卷）第83-86頁，2008年（據1927.10《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n.5,頁75-78原刊影印）；序號17-22，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35卷，第247-249頁，2008年（據1927.12《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n.6,頁111-113原刊影印）；序號23-37，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22卷）2008年，第13-25頁。（據《大雲》n.102,頁9-21原刊影印）。

[36][清]涼澄觀疏鈔，李圓淨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序第2頁。

[37]同上。

[38]同注[36]。

[39]同注[10](第53卷)2006年，第327頁。（據1937.02《佛學半月刊》n.145,頁13原刊影印）

The Contribution of Modern Scholar Xu Weiru to the Study of Hua Yan

Zhao Huayu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Monks and lay people are both important par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like the two wheels of a car and the two wings of a bird. Since modern times, Buddhism has been faced with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aggression,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almost stopped, so the elite lay people have risen. They studied teaching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or they printed Buddhist classics and wrote book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the Dharma.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ook the Buddha's spirit of salvation and compassion as the guidance to save the victims of the disaster. Xu Weiru (1878-1937), from a buddhist family, regarded Yang Wenhui as his teacher. "Studying Xian Shou Zong and Practicing for Amitabha Buddha's Pureland." After establishing direction and ambition, Xu Weiru and his friends set up Beijing Buddhist Sutra Engraving Office, Tianjin Buddhist Sutra Engraving Office in order to print a large number of Hua Yan Sutra, and Xu was determined to print Tripitaka(Dazangjing). Although Xu had no systematic Hua Yan thought, he had a broad vision of the modern Buddhism. He inherited Yang Renshan's Huayan thought, and was able to draw from the Buddhist classics to guide a wealth of people. Although Wei Ru was dead in his sixty years, Xu's spirit can be a heritage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inherit. Mr. Xu is a great man, because h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irculation of a grant many of Hua Yan Sutra books.

Key Words: Hua Yan scholar, Xu Weiru, Hua Yan Classics, Beijing and Tianjin Buddhist Sutra Engraving Office